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圣人心』成就行业状元

——从电影《人生大事》说开去

■文注帆

电影《人生大事》中莫老爷子(罗京民饰)在病床上对莫三妹(朱一龙饰)说的一句话,令我思之再三,“人这一生,除死无大事。做我们这一行,要有圣人心。”这不仅成为影片的核心主题,也点出了我们各行各业的职业精神。话语朴实而道理深邃。

37岁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编导刘江江编剧导演的电影《人生大事》一经面世,便成了今年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不仅创造了超过17亿的票房佳绩,还收获了众多专家与观众的热评。在“后疫情时代”,什么样的电影能唤起广大电影观众的观影兴致,能击中观众的情感与心灵?“不贴标签,不喊口号的主旋律电影”更能赢得广大观众的青睐。有影迷还将其与日本同类题材影片《入殓师》进行比较,评说高下,有专家说它是“后疫情时代”重构都市社会生命哲学的“话题电影”,而更多的论者说它是真实表现城市底层百姓生存状态的“治愈疗伤影片”,真实映射出底层民众艰难挣扎、苦心奋争、自我救赎的“温暖和光明”……正是在这众多的关于社会、族群、阶层、生命、生存、生活、哲学、文化、审美等不同话题的探寻中,实证着这部新人处女秀电影的巨大成功。分析总结起来,我以为有三点启示最为重要:

感恩生活的馈赠

刘江江入职于河北广播电视台后,在“村里这点事”栏目历练了十多年。他从不回避自己从小生活在祖辈从事的殡葬行业生活圈中,跟着爷爷参加过不同人的葬礼,偷食过亡灵美味的祭品,躺身过未装殓的棺材,后来双修了新闻及法学,不仅具备执导殡葬题材的天然优势,更拥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家视角。他感恩独特生活经历的馈赠,早有心创拍一部关于生死主题的殡葬题材电影,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反映华北殡葬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剧本《上天堂》(后更名《人生大事》),成功入围了2019年平遥电影展的“陌陌·平遥创投项目”。

在电影投拍的关键时刻,刘江江遇到了一个贵人,生活再次馈赠了豪礼,这就是成功执导了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青年导演韩延,刘江江称之为剧组的“主心骨”。共同的旨趣,对殡葬行业特殊人群生活的深切关怀,让他俩一拍即合。刘江江表示,“从剧本阶段就介入,他像指路明灯一样。我觉得朱一龙会72变,延哥有火眼金睛,延哥从剧本阶段到执行阶段,一眼能看出来问题在哪,或是哪走偏了。他作为监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每一个主创,有几次我在改剧本的过程中,都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延哥可能还要再踹一脚,第二天就又能挤出一滴油来。我特别感谢他这种工作方式,就像三哥身边的老莫、小文,这些人像加速器一样,让三哥把最好的他拿出来。我觉得这种经验和指点是无价的,适用于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影片最终选择在武汉拍摄,也是在确定了朱一龙出演之后,“因为朱一龙是武汉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他更容易驾驭的城市,因为我们想呈现出来一个更接地气的人物。如果能在他的家乡、他成长的地方来拍的话,这是一个安全方案,所以我们就去了武汉。结果去了武汉就觉得,这个地方完全符合我们对选景的要求,那个地方就是烟火气、江湖气,武汉就是一个让你感受到活着真好的地方。”

如果说选择朱一龙从而选定武汉市作为拍摄地是生活的馈赠,那么,遇见小文的饰演者杨恩又,则是生活馈赠的又一大“惊喜”,甚至被刘江江赞为“是老天爷赏饭吃”。刘江江说杨恩又有种力量会给人惊喜,但是这个惊喜得找到触发键,“所以我们的磨合,就是要找到触发又又惊喜的地方。比方说拍又又的时候,需要我、摄影、执行导演等各个部门形成一个化学反应,我们希望她不知道我们在拍她,非常自然的感觉,还要一边苦口婆心一边当头棒喝,一边小桥流水一边大浪淘沙的和她沟通。和孩子沟通通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得去找。它是一个集体工作,要把她最好的表现引导出来。”

感恩生活馈赠了电影《人生大事》需要的一切,在最需要的档口,遇到了最需要的人!仿佛一切都有上天安排,一切都被现实赋予,一切都被生活馈赠。机遇都给了有备而来的江江。

民生底色映射出时代的暖色

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人民是真实的、现实的、朴实的,不能用虚构的形象虚构人民,不能用调侃的态度调侃人民,更不能用丑化的笔触丑化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

电影《人生大事》故事的开篇,便展示出都市生活的底色,烟火气、江湖气、市井气十足,在这种氛围下小文的外婆悄然离世。不知晓死亡意味的小文一遍遍呼喊着外婆,瞬间变成了孤女。刑满出狱的莫三妹,回到了父亲的殡葬店“上天堂”,他接到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去小文外婆整容送葬。由于小文舅舅的干涉,小文舅舅只好将小文托附给莫三妹照看三天。由于有费用,莫三妹的合伙人王建仁见钱眼开,替三哥应了下来。无奈之中小文进入了莫三妹原本就杂乱无序的生活,二人从冤家对头经一系列的人间琐碎,渐渐成为了莫逆之交,相依为伴,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活剧。

影片通过“六场葬礼和一场婚礼”,从

鸡飞狗跳的市井生活中展现出二人的自我救赎,性格蜕变,乃至人生命运的改变过程。影片的前半程主要是以充满着揶揄幽默的方式呈现出莫三妹的“摆烂”、“摆烂”,女友熙熙跟了冤家对头老六,自己戴了绿帽子还不知晓,父亲老莫哀其不幸又恨其不争,以房产证为吸引希图儿子三妹改邪归正,小文的加入平添了莫家父子间众多烦恼,一手烂牌,一地鸡毛。好在小文的加入不是如莫三妹所说的那样,“你是上天派来专门毁我的是吗?你是看我还不够倒霉是吗?”当莫三妹受白雪启发对小文说出了善意的谎言,你外婆没有消失,“到天上……变成……变成星星了!”之后,从此小文不再是“灾星”而渐次变成了“上天堂”四人组的“福将”。大贾夫妇为安葬早逝的女儿,请莫三妹操办,工匠花费一整天功夫精雕细琢,完成了一座洁白玉骨灰盒,谁料想一夜之间被小文涂鸦画满了星星。因时间紧迫,来不及修复或更换,次日三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大贾夫妇。大贾妻子说出病死的女儿生前最喜欢画画。三哥见状顺势推舟,忙说“这是我姑娘亲手画的,她也想表达对她同龄人的哀悼”。大贾夫妇听罢更为感动,夫人不仅蹲下身去抱紧了小文,大贾还额外送给三哥一个红包,说是感谢你姑娘的。小文为解三哥30万元的忧愁,硬是把外婆昔日的舞伴刘老头拉来,让三哥为他一个活人办一场“皇帝的葬礼”。喜剧桥段,从善出发,歪打正着,正剧效果。

从此之后,一个个喜剧桥段,在小文的催化下,转化为带泪的微笑,哀伤中的温暖,艰难中的希望和冰冷中的暖阳。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魅力再次彰显出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对生活底色的真实描绘,对社会、人性假丑恶的针砭批判,还得益于对时代亮色、人性真善美的温暖礼赞,对理想希望的热切憧憬。三妹感动于父亲对生命敬重和自身职业的信仰。

“圣人心”成就行业状元

孟子云:唯送死可当大事。道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死者为大”的生死文化理念。影片中的老莫终其一生,临别前向儿子莫三妹道出了他的职业操守,“人生,除死无大事。”“做我们这一行,得有一颗圣人心。”以此为契机,莫三妹认识到“由物及心”、尊重他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才能赢得他人的积极反馈。三妹感动于父亲对生命敬重和自身职业的信仰。

从主人公殡葬职业的精神操守,延展到刘江江所从事的电影事业,推而广之到文艺事业,“圣人心”的内涵又是极其丰富的。不仅涉及到信仰的精神高度,道德伦理、精神品格,还涉及到技艺层面。“德艺双馨”,“尽善尽美”。对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先生表述为,这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美学原则与艺术标准”。朱熹说:“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韩愈也特别强调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主张文艺艺术是“贯道之器”,要把“道”贯穿于文艺作品始终,也要成为文艺家“文道合一”的终身修为。他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里的美善关系也就是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文艺家的社会公德内容,也具有文艺的职业道德内涵。”(向云驹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圣人心”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而言,可以理解为是立身、立命、立业之本心,志存高远的文艺工作者而言,完全可以理解为是“传世之心”。这是一种伟大而宝贵的职业精神,将会激励人们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未來!

(作者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艺术委员会主任)

对『理想的观众』和『观众的理想』之浅见浅思

■文左衡

的口碑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太少。

一个始终在观众那里没有澄清、在媒体那里有意无意混淆的问题是,艺术电影的价值原本就不宜单以票房计算。而且,即便以票房指标来看,艺术电影的收益规律是长线,它们将在未来的复映、电影节展、音像制品发行、学术教育等方面获得持续收益。每年,北电影节展映单元影史经典影片一票难求,七八十年前艺术片的衍生文创品也被影迷追捧收藏,这都不是纯商业片可以做到的。

中国艺术电影近年来在创作上存在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沉浸到真实与现实当中去,这也包括对历史或时光的追忆,然后从中寻得存在的体验感。2019年王小帅执导的《地久天长》聚焦失孤家庭,2019年陆庆屹作品《四个春天》(纪录片)呈现一对老年夫妇的悲欢,2021年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纪录片)寻访四位作家的艺术人生,都把中国电影人对真实、对影像纪实属性的理解转化为令人动容或深思的作品。王、贾二作均现身国际A类电影节,陆作则主要在国内电影节展中获得肯定。这固然和影片选题、手法、主创等的国际认知程度有一定关系,同时也再次提醒我们,中国观众对真实的诉求,对现实的态度,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人们毕竟存在差异。这也有助于我们放下西方各大电影节的迷思。

第二个维度是作者表达的自觉。这体现在形式与风格的强化、电影观念与文化系统的自觉。如《兰心大剧院》,凡是关注姜文的观众都无法不注意到黑白影像采用带来的新鲜视觉经验。再如毕赣作品《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地域色彩浓郁的景观与强烈的超现实心理幻境融合,都提醒大众正在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经验。这类影片的出现,本身就显示着中国电影文化生态的丰富与多元,当然也证明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电影观众已可符合电影艺术创作者的理想。事实上,尽管上述影片票房表现仍不能与主流影片相比,但中国观众对电影艺术语言的敏感和趣味却实实在在地增长着,分众化的影迷群体出现,更使艺术电影获得了深度传播、产生广泛影响的可能。如随着毕赣作品的争议,塔尔科夫斯基其人其作、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文学作品《路边野餐》、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等等,都成为影迷一族津津乐道的话题,逐渐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新的传播。

必须看到,这两个维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有的电影作者擅于实现两者的同步与平衡,如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与《南方车站的聚会》,既有着对中国现实景物的敏锐发现与呈现,也有着把影像从纪实、转喻的属性推向表意、隐喻属性的高超手段。而大众向影星和类型片元素的加入又使其获得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这两部影片票房分别超过了1亿和2亿元。

从上述影片的票房表现和大的走向来看,不妨说,只要艺术质量达到一定高度,且有好的宣发支持,结果都可算令人满意。理想的观众不但存在,而且还在逐步增多增强。

如果我们把考察的视野放得更宽广,就会发现,中国电影观众不但是非常理想的巨大群体,他们甚至比许多电影从业者以为的还要理想一些。在媒体融合的传播环境下,难以计数的观众通过购票平台、微博、公众号、短视频网站等等渠道展开了属于他们的表达。如果说发表观影感受和判断、撰写影评、参与讨论等是对被动和传统的表达方式,那么自发地制作以影片为素材的短视频,普及电影专业知识和资讯,就其他网友的影评加以再评判甚至争论,这些都显示出了当下中国观众的电影文化修养和强烈的主体参与意识,当然还有就是他们对电影所表现出的极高的热情和关注。

中国电影观众的理想,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同时也是一种紧迫的压力。中国电影的路正在拓宽和延伸,如何更勇敢地直面现实,更富有智慧地探索表达方式,是中国电影人需要解答的问题。中国电影研究者则要对电影观念的革命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在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做好准备。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电影的未来。

(本文据作者在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论坛——理想的观众与观众的理想”上的发言修改)

“理想的观众”和“观众的理想”是一对辩证的存在,前者主要出现在创作者与生产者的期待里:购票走入影院,对影片质量表示满意以至喜爱,这就意味着对影片思想内容、情感情调、艺术形式等均能领会到并且认同,在走出影院后传播正面评价,这样的观众如果数量众多,那么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后者则呈现在作为消费和接受主体的观众一端,他们对每一部所看的影片、对整个电影行业,都有着自我的期待和诉求。在电影质量足够的条件下,两者的期待可以相互契合。反之可得,如果两者的期待差距拉大,则意味着电影质量和电影文化生态不够良好。

艺术电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形态,思想的深邃、艺术的精深、定位的非商业非娱乐,这些特征都对作者和观众提出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很考验电影行业在资金、技术、宣发手段等各个环节的成色。因此考察艺术电影的处境,是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文化事业的重要指标。本文将中国艺术电影十余年间发生的一些现象、片段做一连线,或可呈现出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轮廓。

2006年,贾樟柯作品《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载誉归来后的市场表现则令人遗憾,仅有30.8万,与同期的国产古装动作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形成强烈反差,以至于当时媒体炒作称“‘好人’不如‘黄金’”。反倒是在海外市场上,通过版权授权和直接发行,收获约4000万。这个事件其实反映出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之初市场和观众的情况——总量小,集中于商业片。

2019年,娄烨导演的《兰心大剧院》入围第7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21年国内公映后票房约2000万。媒体又是一片唏嘘,认为过于惨淡。然而,和当年《三峡好人》相比,中国艺术电影的市场表现和观众接受度岂非已有大幅进步?

再看更年轻一代电影作者。2017年,李睿珺作品《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这也是第一部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发行上映的国产片,票房为253万。2022年,他的新作《隐入尘烟》入围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截止到目前写作时,票房已过2000万。而媒体得与爆棚